

■ 时评

意识形态是“基地”组织全球影响力的核心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从长远看，‘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所呈现的本土化、网络化、分散化、高科技化、草根化、个体化、意识形态化等发展趋势依然存在。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无疑构成‘基地’组织的核心影响力。

2013年4月,从车臣经中亚进入美国的恐怖分子制造了波士顿爆炸案。事实表明,以“基地”组织为核心、以“基地”组织分支机构为主体、以亲“基地”组织的恐怖力量为外围的全球恐怖网络,以及在“阿拉伯之春”后逐步完成调整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仍具有重要的全球影响力。

自2010年底阿拉伯大变局爆发和2011年5月本·拉丹被击毙以来,西方多认为“基地”组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伴随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和在亚太实施再平衡战略,反

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相应下降。由于恐怖活动主要集中于持续动荡的西亚北非地区,以及美国反恐战略的收缩,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度呈明显下降的态势。

近两年来,在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到北非的“动荡弧”地带,除东南亚的恐怖主义相对沉寂外,其他地区仍是恐怖主义泛滥的重灾区,并尤以“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马格里布分支的活动最为猖獗。据2012年12月初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国家排名中,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也门、索马里、尼日利亚等排名靠前的国家都处在“动荡弧”地带。

西亚北非动荡以来,北非马格里布、萨赫勒-撒哈拉地区、阿拉伯半岛(尤其是也门)、叙利亚等地区和国家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重灾区,伊拉克等传统重灾区的恐怖主义也有强劲反弹之势。而伴随叙利亚冲突不断加剧,“基地”组织和全球伊斯兰极端势力大肆向叙利亚渗透聚集,叙利亚已成为继阿富汗、伊拉克之后恐怖主义的又一大本营。

发生在美国波士顿的恐怖袭击事件和中国新疆的暴力恐怖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并非仅在形势动荡的西亚北非地区活动猖獗,它们在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在内的广大地区仍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其影响力不仅来源于蛰伏于全球范围内的恐怖网络,而更为关键的是“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调整能力,以及通过网络传播等手段的扩散传播能力,使

其仍然具有全球影响力。

西亚北非动荡以来,国际社会认为“基地”组织遭遇了严重挫折。有美国学者将这种挫折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在阿拉伯政权垮台的过程中,“基地”组织并未发挥领导作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变化都是在没有“基地”组织任何有实质意义的介入的情况下发生的。第二,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突尼斯、埃及的民众抗议浪潮,以及利比亚在北约支持下的暴力革命,都与“基地”组织所谓“圣战”是推翻现行政权唯一方式的主张相悖。第三,世俗独裁者被推翻后,“基地”组织关于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主张,对于转型阿拉伯国家并不具有吸引力。第四,“基地”组织对“阿拉伯之春”的反应缓慢、滞后,在突尼斯、埃及抗议浪潮发生数周后,“基地”组织才做出反应。第五,推动“阿拉伯之春”的政治理念与“基地”组织的基本价值观相矛盾,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世俗主义等发挥了主要作用,而不是“基地”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以上分析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伴随时间的演进,“基地”组织为摆脱被动局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调整,并突出表现为“基地”组织领袖扎瓦赫里通过网络发布的题为“希望与喜讯系列”(Hope and Glad Tidings Series)讲话,其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扎瓦赫里将“阿拉伯之春”视为实现“基地”组织目标的一部分。“阿拉伯之春”的目标是推翻世俗的独裁者,这与“基地”组织的

目标并不矛盾,推翻世俗独裁者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基地”组织倡导的所谓穆斯林共同体。“阿拉伯民众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伊斯兰的方向,他们揭竿而起旨在推翻涂炭穆斯林生命、妨碍伊斯兰目标实现的美国的代理人政权。”扎瓦赫里针对埃及发出的呼吁强调:“我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一个腐败的统治者已经被推翻,但腐败的统治依然存在……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伊斯兰的统治……最大的灾难是刚刚掌权便陷入非伊斯兰的统治。”

第二,扎瓦赫里对“阿拉伯之春”后建立的非伊斯兰政权予以强烈谴责,呼吁穆斯林民众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扎瓦赫里对革命后阿拉伯国家的选举予以了强烈谴责。他谴责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发明”了一种令美国国务院、欧盟和海湾领导人满意的伊斯兰,这是“一种满足自身需要的伊斯兰”,是“丧失了圣战的伊斯兰”,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已经放弃了建立合法的穆斯林政府以取代现行世俗政府的追求”。

第三,“基地”组织试图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挑战与外部挑战联系起来,不断警告穆斯林民众在进行内部反独裁斗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反对外部敌人即西方和美国的根本目标,要继续进行反对西方的“圣战”。

扎瓦赫里呼吁反抗独裁的穆斯林民众要时刻铭记,“你们的兄弟——穆斯林游击队员与你们在一

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我们确信所有的穆斯林都是穆斯林游击队的战友,真主希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将克什米尔、菲律宾、车臣、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我们祝福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起义,我们都在与他们一起进行反对美国及其帮凶的战斗。”

第四,伴随叙利亚陷入久拖不决的内战,扎瓦赫里宣布把在沙姆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建立伊斯兰酋长国作为“基地”组织的新战略。有阿拉伯专家认为,叙利亚危机若久拖不决,当地的圣战组织很可能会发展成“基地”组织沙姆分支,其活动范围将覆盖整个沙姆地区。成立于2011年底的“胜利阵线”(Al-Nusra Front),不仅频繁在大马士革、阿勒颇、代尔祖尔、霍姆斯等地制造爆炸事件和绑架事件,而且已经明确表示效忠“基地”组织。

事实表明,伴随转型阿拉伯国家陷入严重困难和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基地”组织已初步摆脱“阿拉伯之春”初期的被动局面,并积极主动通过意识形态调整,积极利用中东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并力图将“阿拉伯之春”的发展纳入“基地”组织的轨道。

从长远的角度看,“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所呈现的本土化、网络化、分散化、高科技化、草根化、个体化、意识形态化等发展趋势依然存在,并对中东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无疑构成“基地”组织的核心影响力,而国际反恐无疑仍将任重而道远。

■ 时评

日本修宪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褚宸舸
西北政法大学宪法学副教授

“日本修宪能否实现,关键看国民有没有修改宪法的合意,其次看反对修宪的护宪运动开展情况。

2013年5月3日是日本第66个宪法日。这一纪念日之前两天,在中东外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修宪问题发表谈话,称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不需要向邻国解释,其他国家的反应也不会影响日本的修宪进程。这一表态再度将安倍去年重新执政以来推进的修宪课题推向舆论焦点。

日本国宪法(昭和宪法)1946年11月3日经天皇公布,1947年5月3

日实施,规定了人权保障、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三大原则。众所周知,彰显和平主义的是第九条的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二战结束至今,支持和反对宪法,构成了日本政治法律领域的分歧立场:拥护宪法的观点认为战前体制是错误的,反对派则认为宪法应当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当前日本政坛一批政客对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态度否定。其理由是宪法此规定事实上是美国占领军起草,并强加给日本国民的,所以不具正当性。由于第九条规定了放弃战争,不保有军事力量,实际也不利于某些政客所设想的日本恢复到二战前政治体制的想法。因此,修宪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而近年来之所以成为焦点,甚至有一触即发之势,则同日本政坛形势和政党政治嬗变有很大关系。

1960年围绕《日美安保条约》期限届满后,条约延期还是修改存在争议:有主张续约加强与美国关系的,也有主张终止或修改条约以

期建立与苏联关系的。二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是一个群众基础比较广泛的政党,既有右翼分子,又有激进分子。为了保持执政地位与政权的稳定,自民党和官僚阶层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故其虽然将修宪作为本党方针,但实际上一直未着手启动修宪。这主要是因为1960至1970年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民心思稳,大家都想“闷声发大财”,不想政治上再挑起什么波澜,于是修宪的争议自然退居其次。

但是,1990年以后随着冷战结束,特别是日本经济发展进入长期衰退期。自民党政权基础动摇,1995年自民党失去政权,1997年又重新执政,但政党政治已经呈现出多党化的趋势,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日本政界就掀起派遣自卫队参加海外维和行动是否合宪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主张修改宪法的声音开始走高。同时,自民党因为经济困境,也试图通过修宪主张来博取民众支持,通过挑起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民对经济问题的不满。

21世纪以来,日本国会成立宪法督察会,开始就修宪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各国宪法基础上,提出过

宪法修改的草案。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组阁时,其参选政治主张之一就是修宪。2007年5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与修改宪法程序有关的《国民投票(公决)法》,这被认为是从法律程序上解决了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投票(公决)法》的通过,使安倍政府的修宪迈出第一步。但同年,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失去多数议席。安倍的败选说明日本国民并不支持该种主张。2009年,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开始组阁,其获得政权以后的第一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是修宪派的代表。三年之后,自民党又重新执政,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他出任首相之后,再次加速了修宪进程。安倍在近年来的选举中曾强调要推动修改宪法,改自卫队为国防军,并最终实现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目标。安倍和石原慎太郎等还提出宪法修改的路径应先易后难,从比较容易修改的地方先开始,然后逐步推进。

保守派政治家抵制立宪主义,主张国家主义。目前,日本保守派观点甚嚣尘上,如主张建立军队、修改宪法、提倡爱国、强调恢复日本文化传统等,这都可能给日本宪法的稳定带来影响。日本保守派集中在自民党和

维新会两党中。2012年12月17日安倍就称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的问题可以和日本维新会等党派达成基本一致,表示考虑两党携手修宪。日本维新会是一个新党,其核心人物桥本彻律师出身,曾担任大阪府知事,他主张大力推动宪法改革。

笔者今年3月中旬就修宪问题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宪法学家户波江二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户波教授认为,日本修宪能否实现,关键看国民有没有修改宪法的合意,其次看反对修宪的护宪运动开展情况。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民意调查,目前有约46.3%的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宪法第96条,赞成者约占42.7%。

因此,日本修宪问题的动向和未来发展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修宪如果启动,同时存在向好和向坏的方向修改的可能性。好的方向例如增加规定知情权、外国人的人权、环境权等等。坏的方向,除了舆论关注的是否废除宪法第九条,还有如何理解宪法第二十条政教分离条款,如何看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是否可为公共利益来限制人权,或者主张恢复日本传统文化(包括军国主义)等观点。